

跨界作为方法：《椰壳碗外的人生》述评

徐德林

内容提要：《椰壳碗外的人生》是享誉世界的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学术和思想自传：幼年从中国昆明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再到爱尔兰的辗转，在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的求学经历，在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和教学经历，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田野调查经历，以及退休之后的种种新尝试。通过回溯五十余年的学术人生，安德森旨在阐释其以《想象的共同体》为代表的众多学术成就的灵感与起源，直击现代学术和教育体系的弊病，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研究提供更多的启示。

关键词：椰壳碗；自传；跨界；民族主义；东南亚研究

作者简介：徐德林，先后求学于四川外国语大学、英国桑德兰大学、北京大学，分别获得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媒体与文化研究硕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化研究、英美文学文化批判研究。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是享誉世界的美国学者，著述颇丰，代表作包括《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散》（*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革命时期的爪哇》（*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1944—1946*）、《镜中：暹罗在美国殖民时期的文学与政治》（*In the Mirror: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Siam in the American Era*）、《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Language and Power: 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三面旗帜下：无政府主义和反殖民想象》（*Under Three Flags: Anarchism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再版时更名为《全球化时代：无政府主义与反殖民想象》（*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archists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等；它们早已风靡全球，甚至已成为东南亚研究的经典，不但为安德森赢得了思想巨人、东南亚区域研究权威专家、民族主义研究的颠覆者、当代最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家等殊荣，而且让他成为了备受追捧的学术明星。这一切固然是多种因素耦合的

结果，比如冷战社会情势、安德森渊博的知识和强大的叙述能力，但在笔者看来，这些因素最终得以耦合的关键，则一如《椰壳碗外的人生》可以证明的那样，是他一以贯之所采取的跨界方法。

《椰壳碗外的人生》是安德森应日本 NTT 出版公司编辑远藤千惠（Endo Chiho）之邀，于 2003 年前后开始构思的一部学术和思想自传：“在她看来，日本青年学生对盎格鲁-撒克逊学者出生、求学和成长的社会、政治、文化与时代语境，几乎一无所知。虽然‘西方’政治家、艺术家、军事家、实业家和小说家的传记和自传唾手可得，但学者的传记和自传却寥寥无几。她的想法是出版一本小书，介绍我在爱尔兰和英国的教育、在美国的学术经历、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田野调查，以及我对西方高校和所偏爱书籍的一些思考。”（安德森，2018）¹ 因为对盛行于日本高校的家长制作风严重不满的加藤刚（Kato Tsuyoshi/aka Yoshi）帮助翻译，《椰壳碗外的人生》于 2009 年以日文 ヤシガラ碗の外へ首次面世；因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胞弟，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多次劝说，加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自感年事已高，《椰壳碗外的人生》在 2016 年有了英文版 *A Life Beyond Boundaries*，即中国读者 2018 年开始分享的《椰壳碗外的人生》中文版的母版。书如其名，《椰壳碗外的人生》主要是安德森对自己不断跳出“椰壳碗”或“舒适区”的一生的回顾，以及他对现代学术和教育体系的批评，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则是他屡屡跨界，包括地理的、历史的、语言的、学科抑或规训的边界，喜称自己为“椰壳碗外的青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卫报》宣称，“安德森的所有书写都具有无畏的原创性，借助发现被忽视或被压抑的声音，挑战所有假说。他从不满足于告诉读者他们所知道的。”（安德森，2018）^{封底}

一、跨界的青春

安德森全名为本尼迪克特·理查德·奥戈尔曼·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1936 年出生于中国昆明的一个尊重知识、注重教育的英国-爱尔兰人家庭，“虽然在任何严格意义上说我父母是知识分子都是不正确的，但他们携手为自己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在我们所居住的镇上无与伦比的家庭图书室。他们也鼓励我们养成阅读的习惯，从中了解其它语言的、归属不同阶级和地区的、出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安德森，2018）¹⁵。1941 年夏天，为躲避日益升级的日本侵华战争，加之其父身体抱恙，安德森随全家离

开中国回爱尔兰，只可惜当他们乘坐的轮船到达旧金山的时候，大规模的大西洋潜艇战已让他们的归途化为皂影。他们被迫滞留美国——先是在加利福尼亚，后来是科罗拉多，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后才踏上爱尔兰的土地。回溯性地看，在那个形势瞬息万变、任何选择都无法预知结果的年代，安德森一家虽然历经磨难但不可谓不幸运：避免了日本人的监控，躲过了战火的直接洗礼。“倘若我不是足够幸运地居住在爱尔兰，我很可能在18岁的时候（1954年）就被征召入伍，到肯尼亚或塞浦路斯为奄奄一息的帝国打仗，并且很可能非死即伤。”（安德森，2018）⁷⁻⁸ 所以，关于自己的这段“流亡”经历，安德森如是回忆到：“在加利福尼亚，我曾因我的英国口音被人嘲笑，在沃特福德（Waterford）曾因我的美国口音被人嘲笑，在英格兰曾因我的爱尔兰口音被人嘲笑。人们可以负面地解读这一点，认为它代表一种无根的、缺少稳定身份的生活。但是，人们也可以正面地解读它，说我拥有多重依恋：对爱尔兰、对英格兰（在某些方面），以及通过文学和电影对世界上很多其它地方。”（安德森，2018）³² 或者换言之，在安德森看来，这段“四海为家”的经历虽然把他置于了一种边缘的位置，但不无“有益的感觉”，一如他所言：

当我们男孩子可以骑自行车去上学的时候，我们就接触到了阶级斗争和宗教冲突。我们必须骑车穿过一个相对贫困的天主教社区。那里的男孩们认为我们是势利小人，是半个英国佬和新教徒，时刻准备着干仗。下坡的路并不是很糟糕，因此我们可以骑得很快，而且可以用曲棍球棍武装自己。但是，上坡回家就轮到被这些家伙‘搞定’了。当时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被仇恨，但那是宗教、阶级和种族偏信方面的一个有益教训。（安德森，2018）¹⁷⁻¹⁸

1947年，安德森结束了在爱尔兰的教育，以“奖学金男孩”的身份进入了大英帝国本土的伊顿公学，幸运地接受了英国最后的传统精英教育，“我们必须练习用拉丁语创作诗歌，将英语诗歌翻译成拉丁语。我们还仔细研读过16世纪到19世纪的英语散文大师。最后，必须用不同的语言熟记并公开朗诵很多诗歌。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俄语，甚至爪哇语诗歌”（安德森，2018）²³，因而为后来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智识基础。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智识传统已然成为追忆，“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背诵诗歌的做法几乎消失了。被视为人文教育基础的传统和广义的古典学，也让位于通常被认为更有助于事业、职业和现代生活的科目。而且，粗糙的美式英语正在成为唯一

的‘世界语言’，造成了这个世界的巨大损失”（安德森，2018）²³。1953年，安德森凭借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最初选择的是经济学这一“更有助于未来的领域”，但旋即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这一学科的天赋，动不动就感到厌烦”（安德森，2018）²⁵⁻²⁶，于是转到了古典研究与英法文学，不但阅读了绝对数量惊人的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而且还对发生在这一时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西班牙佛朗哥（Franco）独裁统治等事件，有了某种切身体会，因而形塑了朴素的左翼情感。1958年，“在家里度过了艰难的六个月”之后，安德森“再次撞了大运”（安德森，2018）³⁰，经一位伊顿同学的介绍获得了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担任政治学助教的机会，并因此结识了恩师乔治·卡欣（George Kahin）教授，投入到了方兴未艾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热潮之中，于是便有了他后来在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地长达数十年的田野调查。所以，安德森所谓的“移动的青春”本质上亦可谓“跨界的青春”。

二、跨界的区域研究

正如其主要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散》所暗示的，区域研究是安德森学术生活的核心，所以，他在《椰壳碗外的人生》中专门用“区域研究”一章来回顾美国区域研究的勃兴与发展，比如对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专业的师资、课程设置、教学理念的介绍，对美国东南亚研究传统的反思。安德森指出，以“东南亚研究”为代表的区域研究旨在“为专业性的学术工作创造必要的体制空间”（安德森，2018）⁴⁶，其兴起直接联系着二战后美国所遭遇的国际形势的结构性变化，一如他所言：

区域研究在战后美国的出现，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新霸权地位。政府开始把大量财政和其他资源投入到对西欧之外国家的‘当代’政治和经济的研究中，对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研究的投入则要少得多。随着冷战大幕的开启，对政策研究的兴趣日渐浓厚……在这一轮学术扩张中，驱动力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但是，很多大型私立机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置了政府的‘政策’聚焦。（安德森，2018）⁴²

这样一来，美国的很多高校纷纷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开办了自己的东南亚研究专业，而安德森所在的康奈尔大学则是美国东南亚研究的重镇，其

结果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叶，隐现在越南的灾难，以及对依然有服兵役义务的本科生而言，去印度尼西亚作战的可能性，合力导致了声势浩大、以校园为基础的反战运动，引发了对东南亚的极大兴趣。突然间，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重点大学都出现了对于东南亚相关课程的巨大需求，对此大学管理阶层不得不做出回应。教师职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任何获得了东南亚研究相关专业博士学位的学生，几乎都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好工作”（安德森，2018）⁵⁴。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下，安德森 1967 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轻而易举获得了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专业的教职。

众所周知，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田野调查；所以，1961 年，安德森到印度尼西亚开始了他与田野调查的“初恋”，以期完成日据时期及其对印度尼西亚社会与政治的影响的博士论文。1961 年 12 月底，他来到了雅加达，一直待到了 1964 年 4 月，其间他在印度尼西亚体验到了一系列“文化冲击”，比如“印度尼西亚社会在对待未婚男子和女子之间的巨大差异：青年男子可以自由去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但年轻女子则是被看管和保护的，被尽可能地留在家里”（安德森，2018）⁷⁵，又如“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印度尼西亚孩子就必须帮助弟弟妹妹，尊敬和服从他们的哥哥姐姐”（安德森，2018）⁷⁶，但鉴于安德森成长于其间的社会等级森严，“阶级结构依然对文化和日常生活影响巨大”，安德森依然坚称“印度尼西亚对我而言是一种社会的天堂”，因为“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可以高兴地与差不多任何人交谈——内阁部长、公共汽车驾驶员、军官、佣人、商人、女服务员、中小学教师、异装癖妓女、小流氓，以及政客”（安德森，2018）⁸⁵。正是在“初恋”期间进行的这些愉快的访谈，在随后的十余年间，安德森多次出入印度尼西亚，直到 1972 年他因揭露 1969 年印度尼西亚政变真相而被驱逐。

必须指出的是，安德森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而是很快就把其田野调查转移到了泰国，于是便有了后来蜚声世界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扩散》。对此，安德森戏谑地说道：“我多亏了暴君苏哈托（Suharto）将军给予的一种奇怪的恩情，他 1972 年把我逐出了印度尼西亚，拒绝我入境，直到他 1998 年倒台。因为这个原因，我被迫变得多元化，1974 年到 1986 年间主要研究泰国，1988 年至今研究菲律宾。我非常感激他迫使我超越‘一个国家’的视野。倘若我没有被驱逐，我是不可能撰写出《想象的共同体》的。”（安德森，2018）⁶²⁻⁶³ 另外，正是基于他在印度尼西亚、泰国的田野调查，以及他后来在菲律宾的田野调查，安德森不但成功地对田野工作做出了理论阐释：

仅仅专注于‘研究项目’是无用的。你必须对一切保持无限好奇，擦亮你的眼睛，锐化你的耳朵，凡事做笔记。这是此类工作的最大恩赐。陌生的经历让你的一切感官比平素敏感得多，你对比较的方法喜爱得更深。这就是当你回归日常时，田野工作也非常有用的原因。你已经培养出观察和比较的习惯，它们鼓励或者迫使你开始注意到，你自己的文化同样是陌生的——倘若你仔细地观察，不停地比较，保持人类学的距离。就我而言，我是第一次开始对美国——日常的美国感兴趣。（安德森，2018）¹¹²⁻¹¹³

而且他对美国提出了有效的质疑：

长期以来，美国民族主义的核心神话之一是‘例外论’——认为美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生活显然是无可比拟的。美国不像欧洲、不像拉丁美洲，亦绝对不像亚洲。毋庸讳言，这种想象是荒谬的。依据与某些国家的某个时段的相关性，美国完全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比较的，尤其是与欧洲、南美、日本和大英帝国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等）。另外，这一观点面向其根深蒂固的排外主义。因此，美国才出现了针对在比较政治之内涵括美国政治这一符合逻辑之事的强力抵制。（安德森，2018）¹²²

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南亚研究必然意味着跨界，而跨界又必然意味着比较：“比较不是一种方法，或者甚至不是一种学术技巧；更确切地讲，它是一种话语策略，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安德森，2018）¹⁴³

三、跨越边界：勇气与责任

在回溯其成长和学术经历时，安德森经常把“幸运”“好运连连”等词落在笔端，但我们必须知道，在安德森眼里，

运气经常是以意想不到的机会的形式来到我们身边的，当这样的机会一闪而过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勇敢或者莽撞地抓住它。对真正具有生产力的学术生命而言，这样的冒险精神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在印度尼西亚，当有人问你要去哪里，而你要么不想告诉他们，要么尚未决定的时候，你回答说‘laji tjaji angia’，意思是‘我在等风’，好像你是一艘

帆船，正在驶出港口，驶向浩瀚的大海。这里的冒险不是充斥在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常常喜欢读的书籍中的那种。学者们倘若对自己在一门学科、一个系或者一所大学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在，就会设法既不驶出港口，也不等风。但将被珍视的是等风的准备，以及当风朝你的方向吹来的时候去追风的勇气。（安德森，2018）²⁰⁴⁻²⁰⁵

也就是说，在安德森看来，跨越边界既需要勇气，也是人文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一种责任。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知，安德森于2001年正式退休之后旋即跳出了学院体制的“椰壳碗”，重新点燃了自己青少年时代对文学和电影的热爱。“自2001年退休以来，我已经进行过很多项探索。十多岁的时候，我经常梦想成为一名小说家，虽然我很快就意识到，我并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但是，当我启动最终成为《三面旗帜下：无政府主义和反殖民想象》（2005）这一项目的时候，我童年时代的文学本能被唤醒了。”（安德森，2018）¹⁸³此间的安德森不但“突然想到，如果我们没有19世纪小说家的天赋，详细描述研究资料的最佳方法就是采用他们的方法：快速变换场景、阴谋、巧合、书信，以及使用不同形式的语言（比如混合正式与非正式语言、标准语言与方言）。我一直很喜欢这些小说家们习惯为他们的章节起一个煞费苦心、充满悬念或高深莫测的标题，因此决定以一种完全非学术的方式鹦鹉学舌”（安德森，2018）¹⁸⁴，而且“生平第一次把很多照片放进了我的像小说一样的学术著作之中，其中包括令人钦佩的西尾末广（Suchiro Tettyo）的一张十分出色的照片，他蓄着胡须，戴着领结，身着三件套正装”（安德森，2018）¹⁸⁵。与此同时，鉴于“阿彼察邦（Apichatpong）的影片从未获准在泰国本地进行正常的商业放映，他陷入了与曼谷的弱智审查官的持续斗争之中”，安德森还以一种顽皮的心态“写了一篇讨论《热带疾病》（*Typical Disease*）这本书的长文，但主要是关于不同观众的反应（村民、傲慢无知的所谓曼谷万事通、学生、中产阶级家庭、青少年等等）。……后来我也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加入了反对曼谷弱智的斗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第一次遇见了阿彼察邦，很快就与他成为了好友”（安德森，2018）¹⁸⁶⁻¹⁸⁷。

关于安德森追风的勇气和责任，此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待语言学习的态度和热情。姑且不论安德森有一位智慧无比的母亲，帮助他在少年的时候正确地选择了拉丁语的学习，发现了自己的语言天赋，一如他所言：

后来我问我母亲：‘为什么要选择拉丁语？它甚至比爱尔兰语更为过

时。’虽然她本人并不懂拉丁语，但她知道正确答案：‘拉丁语是绝大多数欧洲语言——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之母，因此，如果你懂拉丁语，你就会发现掌握所有这些语言都易如反掌。另外，拉丁语文学相当伟大，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安德森，2018）¹⁸⁻¹⁹

安德森被迫转向泰国研究的时候，泰语他大字不识一个，而且差不多40岁了，异常忙碌，但他仍然乐此不疲地每天早晨骑摩托车到曼谷市中心的美国大学校友会去上泰语课，一边学习口语，一边在朋友的帮助之下自学阅读，最后写出了讨论泰国的第一本书《镜中：暹罗在美国殖民时代的文学与政治》。另外，为了摆脱“自恋式”的民族主义，安德森还不忘鼓励年轻人从学习其他国家的语言开始：“重要的是要记住学习一门语言并不仅仅是学习语言交流方式。它也是学习一个与我们说和写不同语言的民族的思维和感觉方式。它也是学习构成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以此学习与他们感同身受。”（安德森，2018）²¹⁵

最后，一言以蔽之，“椰壳碗”固然关乎东南亚，但《椰壳碗外的人生》实则关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甚至大学管理者；任何人但凡叩访安德森以跨界为核心的生命故事，想必都会在回溯历史的同时，尝试挣脱“椰壳碗”的束缚。毕竟，正如戴锦华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今日，阅读安德森的自传《椰壳碗外的人生》，在享有阅读一本传记作品的乐趣的同时，我们间或获得了某种历史的校准器，令我们在获知、还原安德森理论的历史与学术语境的同时，获得通过或借重他、他的思想再度深入我们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可能与切口”（安德森，2018）⁴。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安德森，2018. 椰壳碗外的人生 [M]. 徐德林，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